徐枋研究

陈三弟

在明遗民中，徐枋是值得注意的。清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孝廉高蹈者吴越居多，始终不入城府者吾郡李潜夫（天植）、巢端明（鸣盛）及吴中徐昭法，此外不概见。昭法殁最晚，故名尤重。"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则云：徐枋"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称海内三遗民"。可见徐枋在当时遗民中的地位，不很一般。对徐枋这样的历史人物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处于明清交替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汉民族知识文人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方向。为此，本文拟就徐枋的出身、经历、交游及思想渊源诸方面试作研讨。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徐枋之业师

徐枋，长洲人。字昭法，晚号俟斋。其字号又见孔达、王季迁编《明清画家印鉴》云涧叟、秦馀山人、雪床庵主人。明天启二年（1622）生，卒于清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年七十三。祖父名铨，字云涧处士，敕赠翰林院检讨。少受经于名儒申时行，以经学名家。父徐汧，字九一，号勿斋。据《明史》：徐汧少孤贫至孝，为诸生即以名节自任。天启五年，魏大中被逮过苏州，徐汧贷金资其行。周顺昌被逮，缇绮横索钱，徐汧与同里杨廷枢敛财经理之，"当是时，汧、廷枢名闻天下。"大中和顺昌皆东林名流，忤魏阉而死。崇祯初，徐汧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福王时召为少詹事。清顺治二年夏，苏州失守，徐汧自杀，年四十九。

徐枋自幼受庭训。因徐汧的关系，其业师皆当时名人俊哲，如叶襄、郑敷教、朱集璜等，明亡后皆以不降清称高节。叶襄，字圣野，长洲人。崇祯诸生。"杨廷枢领袖复社，圣野执经称高弟子"(《苏州府志》)。徐枋从叶襄读的时间是在崇祯四年(1631)前后。据他明亡后所作《五君子哀诗》谓叶襄："忆昔执经初，枋年未束发。周旋函丈间，抚时思奋发。"当时徐枋还是少年，在他眼里，叶襄多么杰出，"词场主齐盟，意气高巀嶭。旦夕期致身，廊庙润鸿业。"因为这样的影响和扶掖，尚未束发的徐枋已有不寻常的志向了。明亡后，叶襄潜隐园巷，闭户读书。但一直关注着徐枋的有关情况。曾为徐汧作传，又推徐枋之隐居为时独行第一。见徐枋于土室中著《通鉴纪事类聚》、《廿一史文汇》、《建元同文录》等书，寓书于枋，谓人生之三不朽，徐枋"已有其二，立德立言从此而兼并。"叶襄卒于顺治十二年乙未，终岁不详。三原孙枝蔚于是年作有《輓叶圣野》，云"酒负一生债，诗齐七子肩"，盖是定论。

郑敷教，字士敬，号桐庵，长洲人。据《苏州府志》：明崇祯庚午（1630），郑敷教与杨廷枢、张溥、陈子龙、夏允彝同举应天乡试，是时东南文士统会于吴，号为复社。郑敷教"生徒之盛，亚于廷枢，两人俱为乡里所宗。"丁丑，举贤良方正，"以母老辞"。敷教"学深于《易》"，明亡后杜门教授有十余年。徐枋撰有《赠业师郑士敬先生序》谓"枋年十五，即

执经从吾师郑先生游，时崇祯之丙子岁也。”这时徐枋已泛滥诸子百家，自汉至宋说家者流无不熟览。郑敷教及复社领袖杨廷枢、张溥皆徐汧“性命之友”，尤其是郑敷教，据徐枋称庚辰(1640)后其父奉使归里，“独与吾师（郑敷教）性命水乳，长夕无间。每忧时念乱，商榷人物，则促席竟日。”徐汧命枋独师郑敷教，是因为杨廷枢之徒“多持议论”，张溥之徒“多美风流”，非徐枋之个性所及。相反，郑敷教“独先经学，矻矻穷年，究竟同异，研晰幽微”，品行上则“独尚风素、敦内行，恂恂不为虚矫之气。”徐枋从郑敷教学时间一年左右，但所受影响极深。尤其是我们所认识的明亡后的徐枋之思想行为，那种“抱道躬行”，“不与时俯仰”，显然带着郑敷教的思想印记。郑卒于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终年八十。康熙二十三年，徐枋有长诗《怀旧篇》，诗言郑敷教和李灌溪“每岁两先生必同舟过宿草堂，饮酒话旧之余，则二老对奕也。”此谓明亡后事。一个年近八十，一个亦五十出头，虽经历了几多离乱和坎廪，然三十年来，“岁寒朋情终不改”，每年郑敷教必过宿自己学生的土屋，饮酒话旧，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灌溪名模，字子木，官侍御。明亡后居桃花坞。徐枋撰有《李侍御灌溪先生七十寿序》，谓明亡之际，先生当服政之时，“即坚避世之操，潜隐园巷。”

徐枋于朱集璜处受教时间最长。朱集璜，字以发，昆山人。崇祯乙亥贡生。徐枋在《朱先生传》中说，“余十六岁执经于先生，朝夕侍先生者五年。第六年壬午余遂倖售去，而是科得隽者。”徐枋十六岁即崇祯十年丁丑（1637），五年后徐枋成举人。在此期间，朱集璜曾授经于家，徐枋于崇祯己卯（1639）至昆山就学。五年的时间不短，徐枋与朱集璜之间的思想感情得到深入交流。徐枋别离时朱集璜有诗相赠，推学生“夙昔承家学，忠孝天地纪”，在朱集璜看来，青年徐枋即树立了儒家积极有为的人生意识。同样，在徐枋眼里，朱集璜尤有师表。几十年后他在《与朱致一书》中这样表述了自己尊师之心：“自成童以迄白首，服师之训、而佩师之德如一日也。”朱师“切我以义，而薰我以德，实有古人之所少者。”朱集璜亦于明亡后不屈自杀，年四十九。徐枋《怀旧篇》谓先师：“人师独羡紫阳尊，婴城亦继彭咸则。当年贻诗勉忠孝，临风读罢还悲泣。”抒发了对朱集璜的深沉怀念，并包含了一种恋父般的情绪。紫阳，山名，在安徽歙县西南。南宋大儒朱熹父松读书于此。后朱熹居福建崇安，仍榜其所居之听事堂曰紫阳书堂，以示不忘。

值得一提的是，与徐枋同师朱集璜者还有杨炤、朱用纯，明亡后皆以遗民自任。杨炤字明远，处士杨补子。明亡后随父避居邓尉，《明遗民录》卷十一云：“循迹不出，妻子冻馁，吟咏弗顾也。”朱用纯即朱集璜子，字致一，因慕王裒攀柏之义，自号柏庐。据《皇明遗民录》卷六：用纯“年十二，与徐枋同学。有至性，能文章，以学行世其家。乱后隐居不出。”

二、徐枋之隐居生涯

崇祯十五年壬午，徐枋举于乡。房师姜弱荪，江右人，以卓异例补房山。但徐枋还未来得及施展其抱负、积极有为于现实人生时，不久明王朝在北方建州部族和农民起义军的双重打击下宣告灭亡，“忽然丧乱倾家国，痛哭天崩复地坼”（《怀旧篇》），徐枋身心上遭到了最为沉重的摧残和打击。这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巨变。徐枋是无论如何难以承受和屈从这一命运的。作为孝子，徐枋椎心泣血，曾一度欲随徐汧从死。据《灵岩山志》卷七：“忠节公将殉国，枋号泣，欲从死。忠节曰：吾不可不死，若长为农夫以没世可也。”又据《皇明遗民录》卷二云徐枋，“及父死，绝食七日，不死，于是终身不薙发、白衣冠”。徐枋几度寻死但最终没有成功，于是背离吴门，全发亡命，开始了他长达五十年的隐居生涯。

徐枋最初避地吴江芦墟，依其姐丈吴祖锡。是年陈子龙亦避兵芦墟，时相往还。陈子龙，字卧子，号大樽，松江华亭人，崇祯十年进士。南明弘光帝时，以功擢兵科给事中。见朝政没落，辞归故里。翌年南京不守，走昆山，往来松江、嘉善间，密与吴祖锡、夏完淳等谋。南明鲁王监国，授以兵部职衔。顺治四年，联络吴胜兆，结太湖兵举事，在苏州被执，乘间投水死，年四十。陈子龙在芦墟时，实有事谋，对此徐枋亦有认识。后来他在《五君子哀诗》中谓“故给谏陈公子龙”：“公虽伏草间，报韩心未休”，提到了这次相遇，并视陈为西汉之张俭、孔融。陈系徐枋父执，与徐家有交情。崇祯癸酉（1633），徐枋年十二，曾从陈子龙游，对陈持有钦仰之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乱后徐枋与陈有过多次接触，然不主张公诸同好，以张扬自己。全祖望《题徐俟斋传后》云：“石斋先生于丙戌荐俟斋贻书卧子，招之入闽，卧子亦欲俟斋参其军。俟斋皆力辞，以为诸公不过因先人之大节而藐诸孤，是昔人所云因以为利者。故不敢若安危得丧，非所斤斤也。”石斋，漳浦黄道周号。丙戌，即清顺治三年（1646），唐王在福州即帝位次年，时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徐枋力辞黄、陈引荐，不想从军，当然不是怕死，因为自徐汧毕命止水后，他一直没有放弃过死的念头。在他看来，时下诸公之看重他，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其父的名望，而他不会因父亲的关系，为自己谋取任何声誉和私利的。徐枋有自己的生命追求，有自己的“确然不可移易者”（《答陈给谏卧子先生书》），这“确然不可移易者”，亦即后来他对业师郑敷教所作的那种推许：“耻语意气，常守雌节，无矜激之色。故其立身有恒、介然不夺，非色取一时者之所可几也。”（《赠业师郑士敬先生序》）

“立身有恒、介然不夺”，确是概括了隐居生涯中的徐枋之生命特色的。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徐枋年六十三，他曾这样概述前四十年的生活经历：“崩天之敌、稽天之波、弥天之网，靡所不加，靡所不遘，而再益之以饥寒之凛憟、风雨之飘摇、世事之诖误、骨肉之崎岖，靡所不更，靡所不极”（自序《俟斋文集》）。尽管碰到了如此残酷而频繁的灾祸和艰难，然徐枋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生命目标，其坚贞“未尝有毫厘之移，未尝有须臾之间。”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不出户庭”，终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理想人格的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徐枋对业师郑敷教的推许，以及他所标举的“立身有恒，介然不夺”之生命哲学，恰恰产生在生活境况最为竭蹶的时候。《赠业师郑士敬先生序》作于顺治丁酉(1657)，当时徐枋年三十六。据罗振玉《徐俟斋先生年谱》顺治丁酉条：“先生当国变时家有田六顷，自遁迹金墅，连遭寇劫。加以外侮频仍，豪强侵夺，鼠雀耗蠹，恶奴盗卖，境遇日益窘迫。驯致衣食，恒不继。自去年冬至是年夏，则日食一饭一糜而已；冬夏止服一苎衣。是岁十一月，初寒无裩，中寒如疟。复为庸医所误，至于呕血沈疴八十日，绝食者六十日。家族无至者，乃讬后事于张苍眉布衣。”真是天灾人祸，几近于殒命，但徐枋终究不曾悲观愚懦，依然显示了他的贞确和通脱。

二十年后，徐枋于大病中作《病中放歌》，云“年逾五十已衰绝，短发盈头白如雪。病中揽镜更自惊，吾髯仅存一茎两茎黑。”病魔缠身，徐枋已过早的衰老，但是，他仍是那么从容、疏放：“推枕长歌气弥厉，丈夫立志死不休。肯复涂穷少颠坠，人生险阻已尽尝。盲风怪雨独徜徉，精金自然过百炼，高松必定经千霜。”

徐枋隐居期间，尤其在他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曾得到过别人的抚慰和帮助。如顺治十二年，徐枋积官逋数十金，而当时他“家止四壁，薇蕨不供，朝夕仰屋，无所出，势岌岌殆几不免”（《布衣张苍眉六十寿序》），正是在这时候，张苍眉（名隽，号英甫）挺身而出，“为倾其资一日而尽偿之。”后来，亦是通过弘储法师鼎力扶助，筑涧上草堂，“为屋二十余

间”，从根本上解决了他近二十年的流离生涯。

但很清楚，张苍眉是布衣，“淡如婆人”，弘储则是出家禅僧，因此他们的相助受到了徐枋的认可。相反，川湖总督蔡毓荣的帮衬却遭到徐枋的拒绝。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徐枋五十一岁。据孙静庵《明遗民录》卷四十三：“蔡毓荣慕其名，具书致名药厚币托幕下士冯羽道意，（枋）坚不受。而遗书于冯，略云：‘仆年念四，守先人没世之训，长往避世，今年五十一矣。亲知故旧，都谢往还，绝问遗，安敢与当世公侯卿相通交际耶？’”显然，徐枋“坚不受”蔡毓荣的名药厚币，乃蔡系当世权贵；接受了蔡毓荣的帮衬即意味着侧媚取容，意味着变节。

三、徐枋与吴祖锡

据《清史稿·遗逸传》，徐枋遁迹后，“往来惟沈寿民与莱阳姜垓、同里杨无咎、门人吴江潘耒及南岳僧洪储而已。”其实，徐枋所交者远不止这些人，以遗民论，还有吴祖锡、杨补杨明远父子、朱集璜之子朱用纯、浙江黄宗羲、昆山葛芝、归庄、上元黄周星、江宁顾梦游、黄冈杜濬、宁都魏禧、嘉兴巢鸣盛、吴县徐波、太仓陈瑚、吴江朱鹤龄、山阴戴易、以及武进薛寀、王廷璧等。至于禅僧更多。在本节，专门介绍一下徐枋与吴祖锡的关系，似有必要。因为吴祖锡不仅是徐枋姐丈，而且志同道合，诚如徐枋自称“不特休戚同体，直复死生一致”（《与吴子佩远书》）。

吴祖锡，字佩远，号稽田，后改名钽。原吏部文选郎昌时长子，而为伯父贵州按察使昌期后。原籍吴江，自吴昌期始居嘉兴。徐枋初识吴祖锡于崇祯初。崇祯七年，吴祖锡为徐汧婿。关于吴祖锡性格，徐枋后来在《吴子墓志铭》中说：“善接纳，顾瞻謦吐，令人自废。少能急人之困，立捐千金，无少惜。结引豪俊，奔走急难……故天下翕然宗之、趋之若骛。而每当险阨，出奇应变无穷者”。祖锡负俊才，充满着侠义心肠。

崇祯末，吴祖锡经历了两件大事，以致决定了他后来充满悲剧色彩的生活道路。一是其父吏部之祸，一是甲申国难。其父吴昌时，有干材，颇为东林效力奔走。崇祯中官文选郎。周延儒再相，极信用昌时。昌时通厂卫，把持朝官，尝以年例出言路十人于外，同朝咸嫉之。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延儒败，昌时弃市。事具《明史》。其父遭难不久，甲申事发。《皇明遗民录》上说，“祖锡常痛父之难，思立奇节，以大雪之。”其实吴祖锡之雪耻之志，既对着父难同时亦包括了国难的。

明亡以后，吴祖锡到处奔走，“终身冥行，不返家园”。顺治初，曾与徐枋往来灵岩、支硎间，时间近十年。顺治癸巳（1653），吴祖锡欲北游，徐枋作《送远诗十一首》叙说了这期间两人间的交情：“修名恐不立，踯躅长悲吟。避世同所愿，结发棲何津。”由于祸患，身名不能确立，故一起走向了遁迹。又在“同居”中云“比屋慰相思，恰如同株欢。饥劬宁足伤，薇蕨能同甘。”则表述了他们相处一起时的亲近。同甘共苦，有最大的精神安慰。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吴祖锡再次与徐枋相遇，时徐枋避居天池。见徐枋《与吴子佩远书》：“辛丑岁，兄于祸患中间道过存篝灯对语彻夜”。又据罗振玉《徐俟斋先生年谱》顺治辛丑条注云：“考佩远至是再遭名捕，先生《吴子墓志》及全谢山《吴职方传》均不详其事实。考己亥年海师入江，而吴子己亥、庚子皆在金陵，然则名捕之事，必为通海，蛛丝马迹，隐隐可考。先生《孤楫渡江图诗序》，言吴子在金陵窝迹甚奇，其词隐约必为通海无疑也。”是年吴祖锡由于避难，而潜居天池。事发系于通海一案，知吴祖锡依张煌言，实有起事之举。而徐枋与姐丈能

"篝灯对语彻夜"，必有通海话题，且气味相投。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吴祖锡自吴门游中州，徐枋又作《送远诗》，有"客至户不启，迥然绝世尘。独有吴仲来，欢迎意气真"说，抒发了对吴特有的相契和真情。又云"驾言将远游，揽胜无逡巡，发轫宛与洛，再游楚与秦。长啸宇宙间，俯仰千古陈。"对吴的北游，其实亦是对吴的毁家纾难之行为，徐枋寄寓了理解与高扬。邓之诚曾说："证以杨宾所撰《徐昭法吴稽田两先生合传》，乃知枋与姊婿吴祖锡有居者行者之不同，而图谋恢复则一"（《清诗纪事初编》卷一徐枋小传）。我以为这一推论十分准确。

康熙乙卯（1675）秋，徐枋于病患中给吴祖锡写信，云乱后两人交往"聚散睽合、歌哭梦觉、生死死生，诚一部十七史，未易更仆。而此十年中之可一谋面而不能，可一通问而未得，尤为郁结"（《与吴子佩远书》）。又云两人之关系，"不特休戚同体，直复死生一致。"吴祖锡有复书，云"抱志之士，遭值坎壈，最难知者肺腑，最可议者形迹"。又称自己的行动"横被讥评者多矣"，但亦有人理解他，如巢鸣盛、宋之盛。两人皆系遗民。巢鸣盛字端明，崇祯丙子举人。《明遗民录》卷十七："明亡，母亦殁。即筑室于墓，颜其草堂曰'永思'，阁曰'止阁'，而自号止园。三十七年跬步不离墓次。"宋之盛，字未有，江西星子人。崇祯己卯举人。《明遗民录》卷二十五："国变后，结庐髻山，足不入城市，以讲学为己任。"但同巢、宋相比，吴祖锡以为徐枋更知己，"吾兄则越万里而形影相随，更百年而斯须不隔。不特兄之许我毫发无间，弟亦自信为毫发无间。"吴祖锡于徐枋的感情，那种至诚和笃实，在此极见分明。如果未经过生死考验，未有赴难的共同思想，这一刎颈之交显然难以解释。

康熙十五年（1676），吴祖锡将赴齐鲁。遗民恽南田有《丙辰春于扬州客舍赠稽田先生》绝句二首，其一云"极望云霓天路分，几时灵雨洗兰薰。江虬海甲都无准，肤寸惟看岱岳云。"三年后，即康熙十八年（1679），吴祖锡死于胶东，年六十二。赵尔巽在《清史稿·遗逸传》上说："凡明末三王遗臣逸士，其初或起义，或言事，各有所谋。其后或蹈海，或居夷，志不可沮，皆先后云亡。及祖锡死，徐枋为之传曰：'自吴子殁，而天下绝援溺之望，亦可悲矣。'"故赵氏特列吴祖锡为明末遗臣之末。

四、徐枋与弘储

全祖望《涧上徐先生祠堂记》提出欲于俟斋祠堂中增置三个栗主：弘储、戴易和吴祖锡。其理由是"盖先生之得安于涧上也皆储之力，其身后则皆南枝（易）之力也……若稽田其生平踪迹颇与先生相反，而实为同德。"戴南枝易是靠卖画以葬徐枋的高士，而弘储与徐枋之交情亦非同寻常，不特为徐枋得安于涧上，而且，思想又很接近，诚如徐枋《灵岩老和尚六十寿序》称："自以为知吾师独深"，或者说，知徐枋之深者，应该无过弘储。

弘储，亦名洪储、宏储，字继起，号退翁。南通人。姓李氏，父嘉兆，明末志士。天启中入乡校，然绝意功名，潜心佛法。崇祯初，依三峰藏公出家，出世常州夫椒山祥符寺，迁苏州灵岩。入清，弘储每寄怀故国，思谋匡复。据《灵岩山志》卷三："初南都复，吴越兴义旅，师（弘储）皆阴为画策而左右之。连染几及祸，或戒之，则曰：'忧患得其所，汤火亦乐国也。'"每值国难日，必素服挥泪拜，二十八年如一日，徐枋谓"能以忠孝作佛事也"（《退翁老人南岳和尚哀辞》）。

徐枋最早识弘储，始于顺治四年（1647），见徐枋《灵岩老和尚六十寿序》："余不敏，而获侍吾师灵岩老和尚者十有七年矣"。康熙甲辰（1664），弘储年六十，依此推，徐枋订交弘

储当始于顺治丁亥。时徐枋年二十六。从顺治四年到康熙十一年弘储去世为止，有二十五年时间，徐枋与弘储建立了不寻常的关系。

顺治六年，应吴中僧俗要求，弘储由国清住灵岩山。两年后，即顺治辛卯（1651），鲁王政权抗清失败，浙东义士被牵连而死的很多，佛门也受波及。是年腊八，弘储被牵连，赴杭投案。次年征赴永嘉，院鞫被杖，受尽折磨，不久被释。但弘储依然如故，坚贞不屈。次年秋，弘储将其顺治辛卯、壬辰间所写的语录和诗句辑成《树泉集》，特属徐枋作序。在徐枋看来，弘储平时所交往大多“遗民故老，而所为流连风景、举目山河者，又多殷麦周禾之悲焉，此实乃唐宋以来诸大善知识中所绝无者”（《书先生文靖公墨刻后赠灵岩老和尚》）。对弘储推崇备至。在《灵岩树泉集序》中，徐枋又称弘储是“肉身菩萨”、“传佛心印”，肯定了弘储于辛卯之际“身入汤火，无所辞避”的大无畏精神，并直比弘储为南宋反对秦桧投降的爱国名僧大慧宗杲禅师。尤值得注意的是，徐枋于序中称弘储的“书问诗偈”可见其“卫道之严、任道之重”，此“道”亦“圣人之道”，当儒家之道统。徐枋深知弘储，其实弘储乃是出家的政治和尚。当然，弘储会请徐枋作序，他看到了徐枋同自己的思想投合。弘储《树泉集》有《与徐孝廉昭法书》，云“今居士独显己灵，直标大义，揭日月于复盆之下，作甘露于胜热之乡，使末世众生，希荣舍义者绝之于未萌，伤风败教者援之于既溺。”弘储在排揎那些虚荣舍义、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的同时，高度推举了徐枋的“直标大义”，即关键时刻能坚守节操。

徐枋正式为弘储的传承弟子，时间在顺治十六年（1659），时徐枋年三十八。见《退翁年谱》顺治己亥条引退翁伊汉说：“徐昭法槁木形骸十六年，虽戚友罕睹其面，吴中苦节无双。一旦芒鞋诣研山（即灵岩），涕泣稽首，恳余祝法，余亟问故。徐子默然良久曰：‘将弃家学道’。余知其意，遂为铲除，名之本倬，字之伊汉。”作为自己的弟子，弘储首先从生活起居上予以关怀。弘储不仅帮助徐枋筑涧上草堂，还照顾到了徐枋的饥饿与疾病。《居易堂集》卷四有徐枋《答老和尚书》，颇具深情：“天下有饥，犹己饥之，古圣之心也；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古佛之心也。今于法体违豫之时，而必损大药以起采薪之忧；山头绝粮之际，而必捐钵粒以充采薇之腹，是殆兼二心而有之乎！当之愧惧，不知所在，遥望山头，稽首稽首。”弘储关心徐枋的生活境遇，恰恰又是在自己的生活处境处在十分困苦竭蹶的情形之下，弥足可贵。

徐枋与弘储的不寻常关系，还表现在他们的思想交流之中。康熙七年（1668），徐枋有《答退翁老和尚书》，与弘储曾深入讨论过周玉凫的名节问题。玉凫名之玙，号遁翁，长洲人。崇祯甲戌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有《读史感怀诗》。徐枋曾谓其诗：“怨悱本于和平，讽刺存其哀痛，援古证今，悲伤时事”，“回环叹嗟，痛绝心臆”（《周玉凫仪部读史诗序》）。弘储对周玉凫“临终脱然，谈笑而逝”颇有责言。徐枋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周“天真粹白，瑜不掩瑕，忠孝皆本自然，胸中自然绝无一物，非末世矜持名节以行仁义者比。”徐枋以为，对遗民的评价，主要看其主流，看生平一贯表现，如平生是“真忠臣、真孝子”，忠孝两全，则临终前“啼笑俱优”。这一认识应该说还是比较全面的。其实，徐枋为周玉凫辩护，亦是在为自己辩护。

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弘储圆寂于灵岩，年六十七。临终前有嘱：“至于铭传，我先自作，不得更求名笔，虚饰生平，增我罪累。”（《灵岩山志》卷三）但徐枋还是以极度的悲恸，作《退翁老人南岳和尚哀辞》。徐枋推服弘储的功绩，认为自弘储一出，“而始能为佛洗千百年之谤，而佛之道始大全。今而后有名世之大儒巨公者出，无不快然，知佛之道固足以

陶铸尧舜、包含周孔，而无遗憾也。何也，盖吾师能以忠孝作佛事也。”徐枋认为，弘储表面上出家为僧，其思想深处仍是“忠孝”、是儒家积极入世的品格。“吾师之以忠孝作佛事，可得闻乎？沧桑以来二十八年，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每临是讳，必素服焚香，北面挥涕，二十八年，直如一日。”这“每临是讳”即全祖望《退翁第二碑》谓“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忌日。弘储的举动不仅为了纪念崇祯，从根本上说显示了弘储坚决反清、严守道义之思想精神的。

五、徐枋与灵岩之会

康熙三年（1664）二月，即弘储为徐枋筑涧上草堂翌年，黄宗羲离乡，四月间同崇德吕留良、石门吴之振、鄞县高斗魁等至常熟访钱谦益，又与邓大临同访熊开元，复至江阴与李逊之会。五月，旅灵岩山，与弘储见面。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南雷，余姚人。其父黄尊素为东林党后起者中的重要人物，天启间因忤魏阉，死于诏狱。黄宗羲从学于刘宗周，年十九入都讼父冤。崇祯十一年，与顾杲、吴应箕、陈贞慧等复社要员、太学生百四十余人，草《南都防乱公揭》，力斥魏阉余党阮大铖，名噪一时。明亡后，起兵江上，复结寨四明山，旋入海从鲁王，拜左副都御史。桂王既败，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黄乃东林子弟、名门之后，又系一代忠良。弘储见之上灵岩，于是邀集徐枋，以及黄宗羲弟宗炎、高斗魁、王廷璧、吴门邹文江、长洲文秉、周茂藻于崇报寺内天山阁，“纵谈者七昼夜”，这就是有名的“灵岩之会”。

关于此次集会，徐枋《居易堂集》未见记载，但黄宗羲分别有《轮庵禅师语录序》以及《赠以灵上座》、《集灵岩寺》、《与徐昭法》三诗作了介绍。《集灵岩寺》云：“艳说古吴名胜地，松风五月隔兵尘。应怜此日军持下，同是前朝党锢人。霜雪蒙头羞佛火，兴亡昨梦到虮臣。狂言世路难收拾，不道吾师狂绝伦！”这首七律，概括了这次集会的气氛，尤其突出了主持者弘储的狂态，遗民们忧国伤时的情绪，于结句中的“狂绝伦”三字尽为倾抒。而一句“同是前朝党锢人”，进一步渲染了是次集会的悲壮和沉郁。弘储所招集的参与者，多是东林子弟，除黄宗羲、宗炎和徐枋外，周茂藻之父周顺昌、高斗魁之兄高斗枢、文秉之父文震孟、邹文江之师沈寿民皆为东林要人，而王廷璧亦与东林有关。他们聚集在一起，“纵谈者七昼夜”，那么投机和纵情，表明他们有共通的话题和思想立场。

黄宗羲《与徐昭法》一诗，专门对所参与者中的徐枋作了描绘：“人传徐昭法，可闻不可见。我今上灵岩，钟鼓集法眷。相看尽陈人，不参以时彦。徐子最后来，布袍巾帼绢。储公览拙文，珍重压端砚。徐子翻读之，喟然而称善。谓是震川后，叙事无人荐。虞山加粉泽，可谓不善变。落此一瓣香，百年如觌面。出其论文书，并与他著撰。体裁既整齐，字句亦工炼。夜坐天山堂，诸家评略遍。人言子寡言，子言如竹筧。乃知世知子，犹为子之羡。”诗是写给徐枋的，虽属叙事体，但情很深。从服饰、相貌、举止、语言、学问等方面，黄宗羲刻画了徐枋的风度、品格和才情。而“落此一瓣香，百年如觌面”句，尤表现了作者对徐枋的敬仰和理解。我们知道，徐枋隐迹后“键户不与人接”，但通过黄宗羲的这首诗以及《集灵岩寺》，可以清楚看到，在需要之时，徐枋仍会挺身出来，与同志们相往还，放言高论、指点江山的。诗中震川，指归有光；虞山，即常熟钱谦益。

六、徐枋之其他禅友

除弘储以外，徐枋乱后所交禅僧有名的还有：剖石、砺圆、觉浪、筇在、檗庵、南潜、晓

青、含光、昙应、支山、明初、磷雪、去息、知咨、古民、憨茎、逊如等。其中又以剖石、劭圆、筇在、檗庵、南潜为主要。

剖石，无锡人，郑氏。康熙八年（1669）卒，年七十二。剖石与弘储齐名，徐枋云“皆三峰真子，分主邓尉、灵岩”（《五牧劭圆和尚六十寿序》）。崇祯十七年春，明亡前夕，徐枋随徐汧入万峰，谒剖石。应父之命，“执弟子礼”。此后两人断续来往近二十年。徐枋《怀旧篇》曾云，“剖师与余最契，尝留余参紫云仙人公案，闭方丈门，云真须悟却，才放出。其真切如此。”顺治十四年（1657），剖石六十，徐枋为文并作“邓尉十景”画册寿之。并谓“稍抒积愫”，又极称其师“道德高妙，正所谓如高山大川者也。固将与邓尉湖山长存天地之间。”

劭圆，名良琚，董姓，桐乡人。嗣法弘储，师从三峰薙染，出世于毘陵五牧德庆禅院。康熙七年（1668）卒，年六十二。徐枋于康熙丙午（1666）冬，曾寿劭圆六十，云“（劭圆）与余交也二十余年，有如一日。不以盛衰易节，不以得失改念，不以疏数异心。余既流离播迁，师每知余之所在，必策杖过从，而周旋急难者屡矣，而又绝不欲人知，无矜喜自德之色”（《五牧劭圆和尚六十寿序》）。可见，劭圆亦为徐枋患难之交。徐枋在困境中，得到过劭圆的“周旋急难”。徐枋认为劭圆亦具大德：“初掩关邓尉，枵然一室，数年不与世接。及一出，而炽然建立，无废不举。”（《五牧德庆琚和尚塔铭》）。推其禅风之炽。劭圆殁后，徐枋又有《赠五牧劭和尚省墓诗》，云“哀哀悲蓼莪，闻者心痕恻”，“因风洒血泪，草枯缘哭泣”，言辞凄戾，反映了两人间有不寻常的交情。

筇在，名大瓠，字用无，即宣城沈麟生，明末义士沈寿岳子、著名遗民沈寿民侄。父死国事，“自逃于浮屠”。筇在亦弘储弟子，与徐枋交往密切。《居易堂集》中有《与筇在》一书，《答筇公》四书。内容多涉及思想哲学。在与筇在的讨论中，徐枋发挥了传统的儒家观点，强调“有我”，其实主要强调了一种特立独行、“不淫不移不屈”的人格意识。

康熙七年（1668）春，应黄宗羲之邀，筇在往浙江绍兴能仁寺。徐枋为之作《送筇在师越游》三首。其二云“花雨淹游屐，樵风送客舟。江山犹故国，耆旧尽荒丘。一往沧洲远，千春杜宇愁。此行非避地，乘兴独相求。”筇在去浙江，并交黄宗羲，当有使命，所以，徐枋谓“此行非避地，乘兴独相求”，既是忠告，同时也流露了期许。

檗庵，名正志，即熊开元，湖北嘉鱼人。天启五年进士，除崇明知县，调吴江。崇祯间因劾首辅周延儒被廷杖，后遣戍杭州。唐王时，起工科左给事中，连擢太常卿、左佥都御史、随征东阁大学士，乞假归。汀州破，弃家为僧。顺治十年（1653），投弘储剃度，纳戒于灵岩。康熙十四年（1675）示寂，年七十七。徐枋对檗庵十分推崇。其《怀旧篇》云：“昔在朝端现凤麟，后归法苑称龙象”，推檗庵在朝、出家皆成俊哲。又有“过余土室何殷勤，自谓当仁诚不让”，言其交情之深。康熙七年，檗庵七十，徐枋年四十七，作《寿华山檗翁和尚七十初度》，云“折槛容明主，持钓忆老臣。忧天先已坠，觉地岂重沦。幸有身心在，无忘尘刹尊。埋名谁与耦？出世复无伦，北斗推崇望，南星见老人。……青莲为净域，白社爱遗民，耆旧风襟远，师资雅范亲。小生惭孔李，先子辱雷陈。降分过从数，忘年简札频。草堂资待遗，箪食惠无贫。”诗很长，内容既有对檗庵以往敢于直谏的推重，又有对其出家后德行超迈的拜服。同时，亦抒发了檗庵与徐家两代人的交往与厚谊。诗中之“孔李”，谓后汉孔融与李膺事。孔少有俊才，年十岁，谒李膺。李与宾客皆奇之。似含指枋年少即与熊开元有过接触。“雷陈”指后汉雷义与陈重事。雷义举茂才，以让友陈重。刺史不听，雷义佯狂被发，走不应命。时语曰：“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徐汧系檗庵老友，论世法，熊为父执；但论出世法，徐

枋与檗庵同为弘储弟子。又因为同是遗民，声气相通，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交情自不一般了。

南潜，即董说，字若雨，浙江乌程人。董斯张子。明亡，弃诸生，改姓名曰林蹇。后皈依弘储，名之曰玄潜，字俟庵。顺治十三年（1656）秋削发灵岩，更名南潜，字月涵。主古尧峰宝云院。年六十七示寂，时康熙二十五年。徐枋在《怀人诗九首》中说，他与南潜之交情“最善”，“与余敦素交，气味芳兰杜”，情调颇为清超脱俗。又推南潜为僧，“出世复无伦，居然龙象伍”，赋性孤高，极具声名。

徐枋交南潜主要发生在灵岩。据《南岳退翁第二碑》：“归安故诸生董说，经学极博，隐居浔溪。辛卯之难，寺中星散，说独负书策杖入山，以是尤为时所重。”辛卯之难，即顺治八年弘储入狱的时候，当时灵岩山形势很危险。此时南潜还是居士，别人下山，他偏上山，确有一种慷慨赴难的精神。后来徐枋在《与尧峰月涵书》中曾表扬了南潜这种“奋然独往”的品格，并比之南宋义士张浚，谓“为狂澜一砥”。《董若雨诗文集》收有与徐枋诗多篇。《入吴不及晤昭法》约系于康熙十一、二年间所作。当时徐枋“一病几殆”。诗云“涧上垂垂泥路滑，愁中番番竹舆来。同闻病榻声三唤，忍弃前言土一堆。”感情十分真切。亦许南潜早已获知徐枋重病缠身，特地前来探访而未得，不免有黯然之感。康熙十七年（1678）秋，南潜又有《晤昭法，会昭法生日，昭法以为相见一奇》诗，云“涧上闭双扉，灵岩青在眼。吾不来七年，樵道登如栈。入门向忧患，往返复书柬。一声呼先师，泪下不可绾。人间忽师法，云烟荡无限。以君金石心，一令浮薄赧。吴中诸高贤，凋落去如铲。”字里行间，南潜对徐枋轸念殊深，且不胜钦仰。“吴中诸高贤，凋落去如铲”，有的去世，有的降清，亦有为数不少的准备应举博学鸿辞，但徐枋依旧高卧涧上，故南潜谓“以君金石心，一令浮薄赧”。诗中“先师”，似指弘储。又，“吾不来七年”，此七年间隔当系是年距康熙十一年之间。

七、徐枋与画家杨补、归庄

徐枋能画，据张浦山《国朝画征录》卷上：“山水有巨然法，亦间作倪黄邱壑，布置稳妥，不事奇异。用笔极整饬工致，墨气淹渍是净”。在徐枋交游中，有不少系遗民画家。限于篇幅，本文着重介绍徐枋与杨补、归庄的关系。

杨补，字无补，号古农。长洲布衣，明亡后隐邓尉。“善山水，落笔似黄子久。好游虞山，揽取其烟峦雨岫，绿净翠暖，资于笔墨。时以遗民处士称之”（《明画录》卷五）。杨补与徐汧有着生死之谊。弘光时，东阁大学士马士英起用阉党阮大铖，专权昏愦，日事向东林、复社人士进行报复。少詹事徐汧亦在他们打击之列。当时形势十分紧张，“亲戚交游，畏祸观望”，而已隐居在吴门的杨补，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全，毅然“独策蹇至金陵”，为徐汧辩说，痛斥群小，据理力争，使徐汧总算幸免于难。为此，徐枋后来在《杨隐君传》、《隐君杨曰补先生六十寿序》中每每重提这段往事，以标杨补之“慷慨流连”，“以周旋死生患难之间者”侠义之举。

由于父亲关系，徐枋少年时即与杨补相识，一直到顺治丁酉（1657）杨补去世止，近三十年时间。虽然杨补算是父辈，但与徐枋的交往，始终保持着纯真和坦率。顺治乙酉，徐汧以身殉国。遵守父亲遗训，徐枋从此息影杜门。“亲知故旧，都谢往还。”但对杨补独有情愫。据《杨隐君传》：徐枋“年二十余，避乱隐居，隐居（杨补）雅重其人，游处如兄弟，相得甚欢，而隐君年已五十余矣。每过其家，辄欣然引卮酒，笑语终日，或时时涕泣，声尽咽以为

常。”顺治三年秋，杨补随徐枋登吴县阳山，作《同徐昭法登阳山箭阙》诗，谓“干戈白发登临在，犹幸名山志未违”，抒发了与徐枋相处一起时的年轻心态。三年后，又应徐枋招，一起游尧峰。杨补在《徐昭法招游尧峰》中云“笑余吴侬老，兹山屐初试。非子负奇情，衰朽谁复致。从君两探胜，尽豁幽忧意。”通过与徐枋的几次山游，杨补感到精神上得到一种宽展。顺治八年（1651）冬，杨补又有《辛卯冬过徐昭法湖庄》五律，云“深杇接灯火，语绪不知终”，将他和徐枋灯下交谈的场面，刻画得十分形象和动人。

杨补重徐枋的人品，故亦重他的画笔。以为天下士未有及得上徐枋的，“即书画小道，彼（指徐枋）亦将过数百年之绝业”（《杨隐君传》）。当然，这一结论多少带有主观臆断，但实亦表明了这样的事实：中国文人画家其实更看重人品，人品高，其画品亦高。

杨补去世后十年，徐枋作《五君子哀诗》，其三谓杨补，云“昔有大布衣，词场聊顿辔。诗卷留人间，磅礴蔚真气。翰染青山色，笔寄沧洲趣。”极推其文章才气，以为布衣本色。又云“乱后知心期，忘年金石契。浩歌痛生存，杯酒时酹地。”特别肯定了他与杨补的交情，不独有金石之契，且亦显示了两人共有的思想和节操。

归庄，一名祚明，字尔礼，又字玄恭，号恒轩，昆山人。明太仆有光曾孙。年十四补诸生，为复社后期成员。顺治二年六月，参加昆山反雉发义举，事败后僧装亡命，自称“普明头陀”、“鏖鏊钜山人”。与同里顾炎武善，而俱不谐于俗，有“归奇顾怪”之称。归庄工诗文，善书画，其墨竹秦祖永《桐阴论画》云：“奇情逸思，透露毫端，非画家所能及。”归庄晚年主要靠鬻文卖画为生，并借游山看花来消磨其内心的忧愁和不满。归庄与徐枋过从，主要在晚年。康熙五年（1666），即徐枋卜筑涧上后三年，归庄五十四岁，为了了却多年的心愿，发兴往邓尉寻梅。质衣独游，不久至上沙，与徐枋相遇。时徐枋四十五岁。八年冬，归庄游西洞庭后又上灵岩，与徐枋再次过往。见赵经达所撰《归玄恭先生年谱》康熙己酉条引《居易堂集》注：“己酉冬，天气甚暖，玄恭忽来，云待雪灵岩，且出扇索画雪景，因赠绝句：‘为望同云住半途，连朝晴旭丽高衢。知君素有回天志，急扫吴山飞雪图。’”又据归庄《跋徐昭法临曹娥碑》：“徐昭法孝廉，高风亮节，余甚重之。每至山水，杯酒流连，时出其诗、古文、绘事相示。”可以想见，当归庄和徐枋相逢在一起时，于杯酒流连诗画吟咏之际，是何等的忘情和得意。他们同是艺术家，又同是遗民，肯定有着很多共同的思想情趣，有着共同的生命追求。归庄在《赠徐昭法》诗中说“同郡睽违廿载余，相逢怕说乱离初。僧装儒行皆相似，绝俗离群我不如。”其实，这是自谦之词，他们在坚守节操、坚持特立独行的人格方面，应该说没有什么区别。作为知己，徐枋则是这样认识归庄的。他在《题归元恭小像》中谓：“诗三百篇，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离骚者犹离忧也，所谓物不得其平则鸣者非耶？嗟乎！归子其遇穷矣，故发为文章，讬之歌辞，惝怳流连、淋漓感激、痛哭长歌，则千人自废。……归子吾知之矣，其自契于道，而无为不平之鸣耶！”这正是传统的儒家诗论，徐枋于肯定归庄那些忧患、同情现实生活之文章歌辞的同时，实亦申明了自己思想深层的对文学、包括对自己隐居生涯的认同。

八、徐枋殁后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九月，徐枋卒，年七十三。临殁有遗嘱，云：“一，寡媳孤孙，不可移居荡口，山居不便，入城可也。一，自身后，一应家事，无论巨细，俱要仰重杨先生经理，悉听主裁，自然尽善。吾生平知之深，而信之笃。谓在我可托孤寄命者两人，一为易

亭，一为次耕。今次耕在远，不及面嘱，然小孙将来自叨卵翼，奚俟面嘱哉？至拙集遗文，前已与次耕面言，不必更赘矣。”见陈田《明诗纪事》辛签卷十六。荡口，位今江苏无锡东南。杨先生即杨无咎易亭，徐枋年少业师杨廷枢之子。《灵岩山志》卷七："父廷枢死国难，时无咎年甫十二，痛未从死，杜门隐居，历八十年如一日，与俟斋及昆山朱柏庐称吴中三高士。三子皆以先人死忠，以忠节相砥砺者也。”徐枋有《寿杨震伯五十》诗，云“惟予与君交，两世敦孔李。沧桑身倖全，相期共终始。”震伯，无咎字。徐枋与杨无咎父辈皆明季忠节，又系至交，两世通好，其情谊自异乎寻常。故后事任由杨无咎主裁了。“小孙”乃徐枋次子文止之子。文止早卒，年仅二十四。工书画，“文行有父风”。

徐枋葬事，后由戴易、潘耒承任。戴易，字南枝，山阴人。少从刘宗周学，游吴门，年逾七十。与徐枋“一见相得，称老友”（《国朝先正事略》）。潘耒，字次耕，吴江人。父凯，列名复社，康熙初，潘耒从徐枋学，成为徐枋弟子。十八年（1679），潘耒以布衣举博学鸿词，官翰林院检讨。二十三年（1684），徐枋自定文集序列，潘耒编次为《俟斋文集》。徐枋殁后，“仅一嫠妇、一孤孙，饘粥不继，谋葬于祖茔，而族人不可”（《明遗民录》卷四十三）。戴易于是“弃绝百事”，到处寻探，相度经年，终于得地于邓尉之西真如坞。为赎葬地，潘耒先以十金成卷，后戴易又矢愿以卖字，凡四十余金，终于使徐枋葬事成之。而此后戴易仍旧以自苦为极，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事具《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五。徐枋葬后数年，潘耒复赎涧上草堂为立祠，而后潘耒子文虎，文虎子雅奏，又相继修葺之。雅奏名廷壎，诸生。有《徐俟斋祠》："羊肠岭畔幽栖处，一水当门泻作渠。薇蕨西山心自印，藻蘋南涧奠还虚。相忘桑海逃名后，不接贤豪俟命余。此日行人罕凭吊，烟云惟护逸民庐。”诗见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三十。潘氏以外，又有吴江震泽人徐达源、赵筠、王之佐等，为祠堂先后修葺。

徐枋因其高节，无论生前还是殁后，曾遭致甚多文化名人与遗民的探访和仰重。殁后，声名仍显。江都名士马日琯有《过涧上草堂徐昭法先生故居》诗，云“先生居涧上，生死世相忘。剩有三间屋，而无一瓣香。冰霜堪久耐，薇蕨共谁赏。留得潺潺水。终年护草堂。”马日琯以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与之，实谓徐枋乃当世遗民，清风常在。近代名臣林则徐有《题涧上草堂俟斋先生遗像》诗，尤为深沉而真挚："君不见，天水遗民郑思肖，本穴画兰传笔妙。又不见，净名庵主倪云林，迂懒实抱千秋心。先生栖迟灵岩麓，击竹西台同此哭。薇蕨犹餐故国余，蓼莪早废诸生读。……。只今图像瞻遗容，想见丹心一片苦。遗墨流传属纩时，零绡断楮俱千古。吁嗟乎，泽中男子图严光，市中女子知韩康，先生逃名名益彰”。林诗运用了不少典故，如郑思肖、倪瓒、谢皋羽、严光、韩康等，这些人不是遗民就是隐士，皆抱志系恨、品节高超者。林则徐敬仰徐枋，乃至徐枋的声名不朽，这足够表明了传统儒学所构造的人格价值取向，尤其是那种严守道义、坚持节操的精神品格，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当具有永恒意义。